

峨
眉
文
史



11

24.11



峨眉山市政协
文史委员会

编

峨眉文史

(第十一辑)

峨眉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1995年10月

峨眉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李先定

副主任 林维森 李新培 侯有明 永 寿

委 员 林 立 余光六 江德梅 年先春

李琪芳 张丽眉

《峨眉文史》第十一辑

审 稿 杨仲显 李定华

主 编 骆坤琪

副主编 李先定

编 辑 骆坤琪 李先定 林木 聂子谦

封面设计 林 木

校 对 林 木 李新培 聂子谦

目 录

苏南东路敌后抗日斗争·····	何克希 (1)
贺龙元帅上峨眉山·····	何志愚 (11)
永恒的怀念·····	胡全盈 (15)
峨眉个协赴老山慰问记·····	吕云清 (19)
峨眉龙池歼匪亲历记·····	赵 划 (26)
峨眉籍著名诗人梁南·····	许德贵 (31)
丰子恺在峨眉办画展·····	罗友援 (37)
峨眉山市政府代表团回访日本柏崎市、高柳町情况 ·····	李 伟 (40)
峨眉山市妇幼保健所概况·····	李 英 (47)
记峨眉山市精神卫生中心·····	罗培安 石先慧 (50)
峨眉山市卫生学校发展简况·····	市卫校 (56)
峨眉山市红十字会大事纪要·····	邱沛节 (62)
峨眉山市药品监督检验所概况·····	市药检所 (69)
峨眉山市红十字会医院简况·····	赵友良 周泽华 (73)
大峨神水上荧屏·····	朱伯璋 (77)
峨眉山画院赴蓉办展纪事·····	张厚楷 (86)
林森峨眉山悼抗战阵亡将士·····	李新培 (89)
锦墨往来·····	周又郎 (91)
噶玛巴活佛峨眉山朝圣记·····	年先春 (95)
峨山麓龙洞村小水电建设侧记·····	刘大全 (99)
难忘的“六八火灾”·····	蒋仲达 (112)

大办钢铁亲历记·····	冯君明 (118)
峨眉河演变·····	张朝荣 (127)
解放后峨眉草席发展概况·····	陈文治 (132)
苏轼清系峨眉山·····	田家乐 (136)
峨眉山道教史略·····	骆坤祺 (152)
峨眉山古寺遗址拾零·····	郑必辉、和成玉 (160)
峨眉茶文化考·····	林 木 (164)
峨眉电影放映史略·····	张承业 (173)
峨眉的戏剧活动·····	张承业 (176)
峨眉山市市属单位高级职称人名录·····	公长编著 (178)
记峨眉城区三所私立小学·····	谭永富 (192)
性慧和尚轶事补·····	谢荣煌 (197)
峨眉奎阁·····	何宗华 (199)
往事二记·····	李绍楷 (202)
峨眉山的“中国鸽子树”·····	张光廷 (205)
绥山访碑记·····	李先定 (208)
十年辛苦不寻常·····	文史委 (214)

苏南东路敌后抗日斗争

何克希

我是四川峨眉县人。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苏南东路澄武锡、澄锡虞、苏常太等地区，工作了大约三、四个年头。现将亲身的斗争经历回忆如下。

到澄西组织敌后武装斗争

1935年，我由于在家乡组织了一次不成熟的武装暴动，暴露了身份，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同志要我到上海找中央军委。在上海，经“教联”负责人丁华同志与上海地方党王尧山同志联系，以后又因工作需要与特科高原同志联系。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刘晓，组织部长是王尧山。1937年，上海党组织派我到大江南北的淮安、黄桥、扬州仙女庙、江阴西石桥等地开展活动，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那时组织上告诉我，江阴西乡有个梅光迪搞起了一支武装。因此，1937年底我到了西石桥，去了解这支武装的情况，不久就回到了上海。

我第二次到西石桥是在1938年。行前，通过特科老金（现知是徐强同志）介绍给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秘书长）刘少文，确定我去江阴、武进一带组织敌后武装斗争，争取梅光迪抗日。刘少文同志还交给我一封恽逸群写给梅光迪的介绍信。当时组织上明确交待：梅光迪早期参加过

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被捕以后叛变，损害过党的组织，争取他参加抗日是可以的，但不能重新入党。所以我到西石桥以后，遇到一些问题感到很难处理。梅光迪愿意抗日是好事，但他这个人要权，要党的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常常跟我发生争执。如果全部按照他的主张办，当然不行。不按照他的主张办，他又有意见。他问我提出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要求恢复他的党籍。当时组织上给梅光迪名誉、职位够大了，但权不能全部交给他。而梅光迪也有一定的保留，他的武装并没有全部交出来，象周培大的武装、梅光迪始终没有交出来。这是他搞的两手。

争取、改造三支地方武装

梅光迪在西石桥搞的一支武装，人数不多，只有一个连。我们在那里只有三个共产党员，就是我和吕平（李一平，现任长春市委书记）、刘史明（现在江苏），成立一个支部，上海组织指定我担任这个党支部的书记。当时的分工是：我管全面工作，吕平负责党的工作，刘史明负责武装斗争。

我到澄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训练班。学员主要是上海党动员下来的上海工人、学生以及从上海难民收容所下来的人员，一共有几十个人，组成一个连，是吕平同志负责的。这个训练班的不少学员，后来成为我军的骨干。有个同志叫方铭，当时还是个小青年，解放后他担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可惜已经去世了。还有个叶藻，也是训练班学员，曾任过装甲兵司令部的参谋长。再有徐超同志，现任空军学院副院长。训练地点并不固定，主要在澄西一带活动。

我到澄西去，除了争取、改造梅光迪的地方武装，另一

个任务就是设法同新四军党组织接上关系。当时上海党组织已知道新四军到了苏南，要我去找他们。这年秋天，新四军老二团参谋长王必成和三营营长段焕竞带了一个营的兵力挺进澄西，就驻扎在江阴、武进交界的一个村庄上。他们白天睡觉，晚上行军或打仗，行动秘密。我得到这个消息，就主动和他们接上了关系。这时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一篇文章，是一个姓徐的同志写的，说的就是这件事。报纸上还配了一幅画，画面上一个是新四军，一个是“江抗”，意思是新四军培养了“江抗”。

在澄西那段时间，我的主要工作，先是争取、改造梅光迪这支地方武装，后又争取、改造了朱松寿、陈守根等人的地方武装。朱松寿部是江阴东乡的一支地方武装，是由老朱（即张志强）负责联系的。我们正在做梅光迪工作的时候，老牛来西石桥找我了。他主要是来找党的关系的。我接待了他，他说：“朱松寿现在处境不妙，‘忠救’头目袁亚承要搞掉他。”我就亲自跑到朱松寿那里。当时朱松寿部队不在祝塘，记得那里有条港，港北驻扎的是朱松寿部队，港南驻扎的是袁亚承部队。那时朱松寿有1000多人，实力比梅光迪大。据朱松寿亲口对我说，他还去莫斯科参加过党的“六大”，后来说党了。当时我也不可能去调查，但总的印象，朱松寿比梅光迪好。我在江阴东乡与朱会面后，当即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建议主动把部队拉出来，脱离袁亚承；另一个是暂时应付下去，应付不了，就准备和袁亚承打仗。我布置以后就回到了澄西。因为朱松寿没有要我留下，我又不能毛遂自荐留下来。如果留下来，我就可以插手了。再说，朱松寿来找我们，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但不能立刻把他的部队

拉出来，这要看他自己的决心。何况他的队伍不是很纯的，那个地方我也不能久住。那次我到朱松寿处，主要想摸摸情况，不可能给他宣布什么番号，而老牛担任朱松寿部的政治部主任，我记得有这件事。我走了以后，袁亚承下手了，结果朱松寿吃了大亏。我估计袁亚承已经派人打入朱松寿的内部，他手下的一些人已经被袁亚承收买了。

再一个是陈守根，他是澄武地区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当时是保九旅张少华部的一团长，也来找过党。我没有同陈守根见过面。陈守根主要通过吕平同志的关系，派了一些人到我们办的训练班来学习，我们接收了。后来张少华知道了这件事，就借口把陈守根杀掉了。张少华杀掉了陈守根，我们就要搞张少华。但是，我们只争取到梅光迪一个连和朱松寿一个连，没有力量去对付张少华，要是用梅、朱两支部队去打张少华，好比是以卵碰石。正在这时，王必成部队过来了。我和王必成、段焕竞两同志研究后，就在一个晚上主动出击，把驻在江边的张少华司令部搞掉了，为陈守根报了仇。梅光迪、朱松寿的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武装了训练班，壮大了力量，为以后建立“江抗”三路准备了条件。

总之，对朱松寿、梅光迪的问题都要一分为二。我们对梅光迪的问题当时比较难处理，既要争取他抗战，又要抵制他个人的欲望。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感到很吃力。另外，梅自己也要负责，他本身不是很纯，已经变质了。

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

我根据上海党要与新四军接上组织关系的指示，在同保九旅张少华的战斗一结束，就对王必成说：“这次上海党组

织派我到澄西来，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同新四军取得联系，希望你帮助我们解决。”王必成同志说：“这是重大事情，我不能决定。你得亲自去找陈毅同志，他是新四军军委副书记，只有他才能决定。”

当时，我们在江阴争取到梅光迪、朱松寿的两个连，加上我们办的训练班学习，也有一个连的规模，初步形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1938年深秋，我根据王必成同志的意见，带了王国勋、蒋文元两个警卫员（他俩都是上海下来的人，王原是训练班的学员，后在武南遇敌不幸牺牲），到茅山地区晋见陈毅同志。

我们交谈几句以后，陈毅同志发现我也是四川口音，就问我是四川哪里人，我告诉他是峨眉人。由于我和陈毅都是四川人，第一次见面就如同故人，非常亲热。他说：“峨眉有一个耿道弘，你认识吗？”我说：“他又名耿士毅，是我小学时同学，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陈说“他是国家主义派，但是一个好人，我同他很熟悉。”接着我向陈毅同志汇报了工作，他很高兴地说：“你搞得好嘛，你把队伍带过来，我帮你整编。”在我印象中，陈毅同志非常重视抓武装建设。我在茅山多次听他讲过“人、枪、款”的理论。他说没有队伍，没有武装，共产党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井冈山的经验。我在江阴这段时间，自从同陈老总接上关系以后，就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逐步成长起来。

在茅山接上新四军党的关系后，我就按照陈老总的指示，立即返回部队，经过动员，把部队拉到茅山进行整编，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江南抗日义勇军这个名称是我提出来的。我对陈老总说：“我们要有一个新四军的番号

才能打开局面。”陈老总说：“怎么能用新四军的番号呢？这完全是自己限制自己，钱受限制，武器受限制，特别是地盘受限制。你怎么能自己束缚自己呢？”我想了想说：“我党过去领导过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我们能不能就称江南抗日义勇军呢？”“这个名字好！”陈老总听了很赞成。于是就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名称，简称“江抗”三路，梅光迪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实际上是政委，管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江抗”三路成立后编为三个连，大体上原梅光迪的部队为一个连，朱松寿部队为一个连，训练班为一个连，每一个连派了一名政治指导员。一连指导员王新（后牺牲），二连指导员龚鹏佐（后牺牲），三连指导员包厚昌。三连原来是我们办的训练班，各连干部都从这个连选调补充，是“江抗”三路的骨干连。陈毅同志为了加强对“江抗”的领导，还派徐绪奎同志来担任参谋长。以后又派他的参谋长胡发坚同志来加强这个部队的领导。可见党对这个部队的重视了。

随老六团东进、西移

同新四军接上党的关系后，不久，上海党组织通知我回上海汇报工作。我在上海住了几天，项英同志来了电报，要我立即赶回部队。我急忙回到部队，才知道胡发坚同志已牺牲。他的警卫员郑东明告诉我，胡发坚是在武南洛阳谈家村收编大刀会时不幸牺牲的。对他的牺牲，我感到十分痛惜，也感到其中有问题。

“江抗”三路实际是原来梅光迪、朱松寿的部队。我们对朱松寿是相信的，后来大胆地任用了他。在茅山地区成立“江抗”三路这段时间，工作主要是由我负责的。当时处理

事情也比较困难，一有重大的事情，都要向上海党组织请示。同陈毅同志接上关系以后，“江抗”三路的一些做法，都是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进行的。

1939年6月，陈毅同志派叶飞率老六团东进，与我部在戴溪桥会合，成立了“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与我担任副总指挥。党内成立了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任书记，我任副书记。上海地下党的东路特委书记林枫也加工委，这个组织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东路工委受东南局和新四军直接领导。以后，随着部队的发展，六团参谋长乔信明任四路司令，朱松寿任五路司令。

东进途中，老六团是主力，原“江抗”三路配合他们一起行动。我同老六团副团长吴焜同志一起东进当先锋，大部队由叶飞同志率领随后跟上。我们还配合参加了攻打虹桥飞机场的战斗。“江抗”部队西移以后，在澄东地区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袁亚承部挑战，虽然击溃了袁部，但我们伤亡较大。六团政治处主任刘飞同志负伤，吴焜同志不幸牺牲。陈毅同志得悉后率老二团一个营，由刘培善同志陪同从茅山地区来到江阴，决定部队西撤到锡澄公路以西地区。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叶飞汇报一小时，我补充汇报半小时，其他同志发言不超过十分钟。陈老总对大家的发言时间作了限制。他风趣地说：“你们十八路诸侯会师，部队是壮大了，但不巩固。战争期间讲话从简。”会议以后，部队撤至扬中整训。

华中局指示恢复东路工作

通过扬中整训，常熟“民抗”上升为“江抗”。“江抗”又上升为新四军二团（即新二团），团长是徐绪奎，我

仍然当政委。以后，新二团北上参加黄桥战斗，我则回到东路，与吴仲超同志一起负责恢复东路工作。吴仲超同志任东路特委书记，我任东路“江抗”司令。陈毅同志向我和吴仲超交待了恢复原来东路地区的任务，并派原闽东游击队骨干、延安抗大毕业的陈挺同志，随我们一起到了东路。我接替夏光担任东路“江抗”司令，吴仲超兼任政委，夏光改任参谋长。我们又东进到太仓，一日三战，敌人受到沉重打击，退回据点困守。在我军的影响和争取下，太仓境内的国民党保安四团一营随我军东进至昆山地区，其余两个营留在太仓地区活动。一营营长是个特务，到了昆山以后，他看到我兵力不大，图谋不轨。我们就采取果断措施，将该营营长及其短枪队全部缴械，并集合全营士兵，宣布特务营长的罪状，号召愿意抗日的留下编入我军，不愿意留下的发资遣散。这样，我们部队经过扩编，成立了“江抗”东路第二支队，由陈挺任支队长。“江抗”东路第一支队是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以嘉定和浦东的地方武装组成的，戴克林任支队长。

1940年春，华中局发来一个电报，指示由谭震林同志负责江南的全面工作。谭震林同志来到东路以后，江南确实打开了局面。而他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我们这支队伍，即前面提到的“江抗”东路一、二支队。这年初夏，谭震林同志带了一批干部来到东路加强领导。谭震林同志担任“江抗”东路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我任“江抗”东路副司令，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开荆任参谋长，夏光又被改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同时还成立了“江抗”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我和吴仲超、江渭清、温玉成为委员，

统一领导江南的敌后斗争。并划了澄锡虞、苏常太、昆嘉青、浦东等几个地区，各设地委。皖南事变以后，又把主力部队编为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三个团，成立新四军十八旅，江渭清同志任旅长，温玉成同志任旅政委，夏光同志任旅参谋长。还成立江南行政委员会，我任该会主任并兼江南保安司令，吴仲超同志兼政委。下设几个专区，各区设专员。与此同时，在祝塘等地还建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就是代表政权机构的行政单位，主要为新四军办事，为共产党办事。皖南事变后，祝塘办事处即改为江阴县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谭震林同志决定消灭投敌的胡肇汉部队，命我率领“江抗”东路一、二支队前往阳澄湖地区完成这一任务。当我军进入阳澄湖畔的张家浜，正在听取特委书记张英同志汇报的时候，苏州出来一批日军，直向张家浜逼近，正陷入我伏击圈内。经过一日一夜的激战，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我军军威大振，群众称我支队为“老虎支队”。

1941年下半年，我曾率领警卫一团在澄锡虞地区坚持反“清乡”斗争，后来转移到长江边，在沙洲一带活动。当时斗争形势极为艰苦、复杂，每天转移数次，差不多天天打仗，但部队士气很高，信心也很足，上下一心，要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沙洲是个好地方，老百姓也很好。我们在那里，每到一地，晚上一敲门，老百姓都把门开了，热情接待我们。我对部队和沙洲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当时，警卫一团团长是杨知方，政委是一个老同志，名字记不清了，包厚昌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由于他们都是当地人，情况熟悉，加上杨知方同志出身在沙洲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同上层关系

也较密切，因此能与敌人周旋，使敌人常常扑空。我们则看准时机，派出少数部队在敌人归途中即伏袭击，取得不少胜利，常常使局面由被动变为主动。

不久，谭震林同志从路西拍来电报，要我回去，由温玉成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我接电后就由沙洲经苏北，再渡江到澄西参加谭震林同志主持的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会上决定部队北撤。会议尚未结束，沙洲部队受到损失，温玉成只身回来。会后，十八旅撤至江高宝一带。我们随六师师部撤至如皋境内。以后，我就奉命去华中党校学习，离开了苏南东线地区。

（程以正、田柳、徐泉法整理）

（本文由和治戡同志提供）

贺龙元帅上峨眉山记

何志愚

我看过几篇有关贺龙游峨眉山的作品，与事实有差异，本人是从他到来后和离去前的向导和解说员，比较真实的了解情况，现记述于下：

1957年端午节前一日（农历五月初四日），伙食团为了让大家回家过节，提前一日会餐。午后5时20分许，大家正举起“雄黄酒”，突然贺老总一行人来到食堂，由于他忽然的来临，引起所有的眼光都向着他窃窃低语“贺龙！贺龙！”而我的内心更为紧张的嘀咕：“真不凑巧，明日一定会陪同上山，回家过节怕不可能了？”果然不出所料，想象变为了事实。

贺龙当时是西南军区司令员，同行的还有宋任穷、李井泉、李大章……，尚有几位不知姓名。

五月初五大晴，从报国寺、经龙门洞至清音阁午饭。起初，我以为不应与首长并行，杂在保卫人员中间。可是有人拍着我的肩头“嗨！你怎么在这里，快前头去让首长好问话。”于是，我就同专职保卫员在首长左右。保卫员个子不高，身板很结实。首长上坡则退在后面，下坡又赶忙跑在前头，意思是防止首长前倾后跌。

午饭后略事休息，再由一线天达洪椿坪歇宿。由于溪水干涸，就顺“二十四道拐不干”从溪底过去。在一线天桥梯上，他问我：“这是游山大路吗？”“不是”，我说“是寺

庙运输便道，1953年金山整修时始架桥樑以资观赏”。“以后采用钢骨作架就更坚固了。”后来就实现了首长的指示，成为目前的现状。

在洪椿坪都住在“闲居”。晚间聚在一起聊天，不知那个多嘴，说我会弹古琴，恰好，庙里有琴一张，我只好硬着头皮去献丑，弹了一曲《高山》、一曲《阳春》。老实说，我真有点惊慌而手指也在颤抖，有好几处都弹错了。首长仍然叫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你是峨眉人？”他突然问我。

“是”。

“认识和成孝吗？”

“不认识，只听说过”。

又问：“林森在这里住多久，住什么地方”。

“住了三个多月，就住在这里，白天则独在后殿楼上看书、写字。‘闲居’，也是他命名的”。大家又闲扯一阵就睡去了。

初六的天气很阴沉，一行在浓阴翠霭中往九老洞前进，刚过“寿星桥”，我介绍说：“开始上九十九倒拐了”，“真有九十九个拐弯吗”，不知是谁这样问。我说只有七十三拐，“名山道路也在虚报了”，贺老总很风趣的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首长不仅健谈，而很诙谐，平易近人，也很健步，爬大坡也从不见他出汗、喘气，经常显得愉快、轻松，并影响及同行诸人都忘去了疲劳，谈笑风生中不觉间到了仙峰寺。略息片刻，他首先提议去参观九老洞。

首长问：“这个洞有什么特异处？”我回答提：“好就